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跨族群、跨语言与 公共舆论建构： 槟城点石斋印字馆的报刊事业 (1895-1911)

Cross-ethnic, Cross-language and Public Opinion Construction:
Newspaper of Penang Criterion Press (1895-1911)

江剑聪
(HUNG Kim Chong)

摘要

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在1878年底面世后不久，南洋槟榔屿在1883年即出现一家点石斋印字馆。这家印字馆乃当地重要华侨商人林花鐸（1836-1912）所创设。起初的业务主要是承印些华英商业文件、书籍，贩卖进口文具等。随后，在林花鐸幼子林成辉（1872-1943）的主导下，槟城点石斋印字馆开始拓展报刊事业，陆续发行华（《槟城新报》）、巫（*Chahyah Pulau Pinang*）、英（*Straits Echo*）新闻报纸，对本地文化乃至马来亚公共舆论的发展产生影响。本文旨在还原槟城点石斋印字馆的时空背景，并试图说明其在辛亥革命前（1883-1911），作为本地华人印刷机构，其如何发展它的大众传播事业，为不同族群作出贡献。

关键词： 槟城点石斋印字馆、林成辉、槟城新报、亦果西报

Abstract

Soon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Dian Shi Zhai shuju” printing house in Shanghai at the end of 1878, Criterion Press, named in Chinese as “Dian Shi Zhai”, was also founded in Chinese Penang in 1883. This printing house was founded by Lim Hua Chiam (1836-1912), a prestigious local Chinese businessman. Initially, the business were focused on printing business documents, books and selling imported stationery. As time went by, the youngest son of Lim Hua Chiam, Lim Seng Hooi (1872-1943), took charge of Criterion Press and expanded their businesses to the newspaper sector. The newspaper was subsequently published in different languages, including Chinese (Penang Sin Poe), Malay (Chahyah Pulau Pinang), and English (Straits Echo). It had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and the forming of public opinions in Malaya. This article aims to contextualize the evolution of Criterion Press and explain how a local Chinese printing enterprise developed its mass communication business and contributed to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1883-1911).

Keywords: Criterion Press, Lim Seng Hooi, Penang Sin Poe, Straits Echo

一、前言

对于“点石斋”的记忆，较多人联想到在中国上海由英商美查（Ernest Major, 1841-1908）所创办的点石斋印书局，以及那风靡一时，采石印出版的《点石斋画报》。上海点石斋的文化事业，无论在书籍出版、知识传播或视觉艺术等各种层面，都在晚清中国产生重要影响。¹

同一个时期，位处英属海峡殖民地北方的槟榔屿（Penang），亦出现一所同样以“点石斋”命名的石印印刷机构——槟城点石斋印字馆（Criterion Press）。这家印字馆成立于1883年，乃福建侨商林花鐸（1836-1912）所创设。起初业务主要承印华英商业文件、书籍，贩卖进口文具等。10年后，在林花鐸幼子林成辉（1872-1943）的主导下，槟城点石斋印字馆（以下简称槟城点石斋）开始拓展报刊事业，陆续发行华（《槟城新报》）、巫（Chahyah Pulau Pinang）、英（Straits Echo）新闻

报纸，对本地文化乃至马来亚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槟城点石斋与上海点石斋一样，均以石印技术发迹，成为各自地方的重要标签。此外，它们都兼具文化与商业的性格。两者均把文化事业，透过商业模式来经营。不过，两者的业务内容有明显不同。比如槟城点石斋并未出版过任何画报，尤值得注意者，是其传播事业版图跨越族群和语言。这里不免令人好奇，槟城点石斋与上海点石斋，究竟存在多少程度的影响或继承关系？槟城点石斋的文化版图，其特色为何？其对槟城当地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问题，均为本文撰述缘起。

与上海点石斋形成强烈对比，槟城点石斋近乎被世人所遗忘，有关这家印刷机构和其文化事业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开展空间。本文之作，旨在还原槟城点石斋的时空背景，并试图说明其在辛亥革命前（1883-1911），作为本地少数的华人印刷机构，其如何发展它的报刊事业，为不同族群作出贡献。第一节拟先梳理槟城出版机构的历史发展，分析槟城点石斋出现的特殊意义。第二节主要讨论槟城点石斋文化事业的开端——《槟城新报》的创办背景、报纸内容、编辑群以及舆论影响等。第三节则重点介绍 *Chahyah Pulau Pinang* 以及 *Straits Echo* 这两家外文报纸以及在当时产生的影响。

二、槟城点石斋印字馆成立背景

“点石斋”出现在槟城的特殊意义，需先了解此地出版机构的历史背景。18世纪80年代以前，槟榔屿隶属于吉打（Kedah）王国，据说那是满目荒凉、人迹罕至之地（姚楠、张礼千1946：18）。自178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弗朗西斯·莱特（Francis Light, 1740-1794）与吉打苏丹签订合约，合法占有槟榔屿，并在8月11日在当地竖起英国旗帜后，槟榔屿从此归属英国，成为英国殖民马六甲海峡的首站。自此，陆续有大量来自不同地方族群的人口，或经商或劳役而移入此地，开启新生活。与此同时，槟城的社会结构、商业经济、文化风俗等，也随着英国人的殖民而有了崭新的面貌。

在槟城点石斋成立之前，此地的出版印刷业主要为英人所主导和垄断。而当时出版物所采用的媒介语多数为英文和马来文。

槟城暨马来亚最早的出版机构和刊物，为Andrew Burchat Bone于1806年发行的英文报纸*The Government Gazette*，后改名为*Prince Of Wales Island Gazette*。该报是早期英殖民政府的重要喉舌，专门登载官方公告、新闻消息以及广告等²（Md. Sidin Ahamad Ishak 1992: 21）。Bone于1815年逝世后，该报曾一度停刊，在1830年代经过重组后，更名为*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简称*Pinang Gazette*）重新刊行（Arnold Wright 1908: 258-259）。这份报纸发行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其与另一份英文报*Straits Echo*合并，迄至60年代初方结束其超越一个世纪的历史使命。

另一个由英人主导的出版机构——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亦尝对槟城一埠的出版文化事业产生影响。伦敦布道会是马来亚最早出现的有系统组织之印刷出版机构（廖文辉2011: 149）。最初，在广东传教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因满清政府实施严禁在华传教的政策，迫于无奈之下，惟有另寻出路。经过综合考虑，最终决定在马六甲设立据点，于1815年指派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先行主事当地的福音宣传、建设书院以及出版工作（Leona O'Sullivan 1984: 62）。被誉为中国现代报刊鼻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即发轫于此时（戈公振2003: 74-78）。随后，伦敦布道会亦在槟城和新加坡先后设立了据点。

槟城最早的中文出版事业，是由伦敦布道会中这群传教士所操作，而且也与马六甲、新加坡几个据点共同合作组成海峡殖民地的知识传播网络。³

虽然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早在1820年已来到槟城设立学校，传播福音。⁴但要迟至1832年，在贝敦（Thomas Beighton, 1790-1844）等人的努力争取下，槟城伦敦布道会才有属于自己的印刷机器，开始其出版事业（Ching Su 1996: 178-198）。他们于这时期的出版内容，主要针对马来人市场，以马来文为媒介语的宣教品有将近

60种（Ching Su 1996: 191）。至于中文出版品方面，据学者研究指出亦存在少数。自1832年以降的10多年之间，槟城伦敦布道会共出版了5种中文作品。其中包括《天国八福》（*The Beatitudes*）、《福音总论》、梁发（1789-1855）撰之《论灵魂生命贵于珍宝美物》等（Ching Su 1996: 193-194）。这些出版品在印制的量上基本都逾千份，以利于散播宣传。槟城伦敦布道会所出版的以上这些出版品，无论是以中文或马来文为媒介语，其背后动机均以传教为目的，旨在宣传基督教义，拥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随着贝敦于1844年逝世后，由于后继无人，槟城伦敦布道会的出版事业，遂亦告一段落，正式走入历史。

就目前所见的史料来看，从1840年代到1880年的这四十年之间，槟城的出版业似乎处于沉滞状态。根据1881年海峡殖民地的工商名录（*TSSD 1881*: 86），除了上述提到的英文报*Pinang Gazette*持续刊行外，并未见其他出版机构或刊物在槟城营运。纵观18世纪末槟城开埠以降出版印刷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业几乎都由欧洲人所主导，而不见其他族群的参与。然而，到了1883年，一家由华人——林氏家族——经营的印刷机构，在槟城崛起，打破了这近一世纪以来由欧洲人所垄断的局面，成为槟城华人出版印刷事业的先驱。这家机构就是接下来本文所要重点叙述的点石斋印字馆。

槟城点石斋印字馆，英文名为Criterion Press，为福建僑商林花鐸所创办。这里我们先对林氏生平事迹作一简单介绍。林花鐸字汝舟，福建海澄人。1840年代末，年仅13岁的林氏即离乡背井，远赴南洋槟榔屿讨生活，起初充当店员为生。23岁那年，他与友人合伙开办“怡兴号”，经营布料生意，销售到亚齐一带，获利颇丰。70年代，因荷兰与亚齐战事爆发，这门生意最终被迫告吹。但林氏很快就重振旗鼓，因精于岐黄，遂于1876年开设了“老万全”药铺。1883年，将届天命之年的他又投入到文化事业，开张石版印字馆，建号“点石斋”。林氏为早期槟城华社重要人物，尝任槟城参事局员，平章会馆福帮大总理，历任林公司、清和社、同庆社之董事，1903年获海峡殖民地政府授予太平局绅（Justice of Peace）。1908年，又获清朝政府钦赐道员衔。其在世时名望之重可见一斑（林博爱1923：

19; 《槟城新报》1912年2月13日; Arnold Wright 1908: 260; Loh Wei Leng 2013: 118-119)。

林花鐱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动机, 或说受到何种刺激而创设槟城点石斋? 林氏本人并未留下只言片语, 而可征的文献也很有限, 故这问题并不太容易回答。推敲个中原因, 这很可能与上海点石斋印书局的出现有极大关系。

1878年末, 在上海早已经营申报馆好些年的美查, 从国外购置了新的石印机器, 创办了点石斋印书局, 正式开始其石印事业。起初的业务, 主要是印刷和贩卖楹联、金笺等零星散件, 后来, 业务逐渐拓展至书籍、字典等方面。迄至1880年3月, 上海点石斋已有24种石印书可供出售, 其中《康熙字典》缩印本, 更是当时的畅销书, 让上海点石斋大获其利。学者指出, 上海点石斋涉足石印业在当地所获得的巨大成功, 大大刺激了商界, 以致许多商家都纷纷投入到这个行业, 创办书局, 印书办报, 如蜚英馆、江左书林、扫叶山房, 以及影响最广的同文书局等, 都是在上海点石斋的刺激下而诞生(张伟2014: 587-590)。

镜头场景转回到南洋槟榔屿。也许是受到中国这波石印潮流的影响, 致使林花鐱兴起了创设点石斋印字馆的念头。而念头的来源, 或说接触到“点石斋”的机缘, 可能跟林花鐱的职业和兴趣有关。

作为海峡英殖民地重要贸易输出与转运站之一的槟城, 其与中国通商口岸常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尤其那最现代化, 中西交汇的上海租界。槟城侨商或经商或省亲, 常有机会回到中国。⁵ 林花鐱在1876年开设老万全药铺, 为补充药材和其他货源, 自然也须经常往来于中国。也许是在这样的机缘让林氏获闻当时赫赫有名的上海点石斋石印事业, 并促使其兴发摹效的念头。而另一个可能机缘, 则是林氏对于墨宝的兴趣。

《槟城新报》尝有一段话形容槟城19世纪末的文化风气, 其谓: “槟城文风之盛, 冠于南洋。或工书, 或善画, 或长于诗词者, 不胜枚举。诸绅商尤玩爱文墨, 见有名人字画书籍, 不惜千金争购置之。”(《槟城新报》1896年7月25日) 据《南洋名人集传》对林氏生平的勾勒, 其中提到: “商余之暇, 则讲求文翰事。尝将‘如’字, 作草书大字似如意状,

以赠知交，受者多什袭珍藏之，以其笔法如神，故可贵也。”（林博爱1923：19）可见林氏为《槟城新报》所谓“玩爱文墨”之华商。作为一名颇有资产的文化商人，多少也会关注墨宝市场的动态消息。

前面提到，上海点石斋起初的业务，主要在于楹联、金笺等艺术品之出售。上海点石斋在《申报》初登场的广告《楹联出售》宣称：“取古今名家法书、楹联、琴条等，用照相机照于石上，然后以墨水印入各笺，视之与濡毫染翰者无二。”（《申报》1878年12月31日）这种能够将名家墨宝复制得“与当时书就者无毫厘之别”的崭新技术（《申报》1879年2月21日），对于“玩爱文墨”的爱好者而言无疑是一个福音。深于此道的林花鐸，或许即因其业余兴趣而注意到上海点石斋，甚者可能还亲临过现场进行消费。即便他未尝上门光顾，在这“文风之盛”的槟城，常经商上海的绅商至少也会有人认识到上海点石斋的崭新石印技术，并将此消息在“玩爱文墨”的圈子传开，最终传到林氏耳中而引起他对上海这家石印书局的注意，使他意识到此商机在槟城印刷市场落实的可能性。

当然，以上都仅是就目前所见史料所作出的推论。但无论基于何种原因，考虑到上海点石斋在1878年末开设后，不到几年时间即又在槟城出现一家同样以“点石斋”命名的印字馆，且同样采用石印技术，这看来不应该是巧合。从中国当时的石印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之情形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林花鐸在1883年创设槟城点石斋，很大可能即源自上海点石斋所获得的灵感。

至于林花鐸的动机，应该与美查以及其他投入石印行业的商家一样，均是窥准石印出版印刷的商业潜能，以营利为目的。

据1881年海峡殖民地蓝皮书（SSBB 1881：18-19）的人口数据显示，当时槟岛人口有90,951人，威省97,924人，合计188,875人。其中华人部分，槟岛占了45,135，威省22,219，合计67,354人。至于政府和企业机构方面，据1881年的工商名录（TSSD 1881：79-87），至少拥有50家。这还只是约略的保守数字，若加上槟城周边地方人口和企业数量，则不啻为一可观的商业市场。再结合上述出版印刷事业在槟城的发展来看，从18世纪末开埠以降，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仅出现几家出版机构，后来仅有一

家，且主要为欧洲人所垄断，可见这个行业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综合以上所述，在此可以合理推断，因受到上海点石斋的启发，具有敏锐商业眼光的林花鐱，窥准石印商机在槟城印刷市场的发展潜能，于是将这个在上海石印出版业名声最响亮的品牌“复制”到了槟城，以几百元的本钱（Arnold Wright 1908: 259），在中街（Beach Street）第230号和232号成立了槟城印刷界首家由华人营运的点石斋印字馆，从此开启其文化事业。

三、文化事业的开端：《槟城新报》

槟城点石斋拥有从欧洲添置的印刷机器，除了石印，1888年还添置了凸版印刷部门，且具备各语种——英、华、巫、印——的字体，堪称齐备。开张后的第一个十年，其还仅仅是一家纯商业性质的营利印刷机构，主要为政府机关和商界服务（Arnold Wright 1908: 259-260）。

关于其馆内人员和业务内容，我们可以从点石斋刊登的告白得知：

本斋承印华英文字，已十有余年，驰名各埠。蒙诸商翁惠顾，源源而来，是以精益求精，故不惜工本，从英国采办印字、裁纸各机器，并有英国各款字体及各式花边鸟兽等件。延中西名工，技艺超绝者，排印一切大小文字，以待与诸商翁刊印书籍、纸牌、单件。并有印便大小报关字，兑酒吧示，各款朱律花边、标头出兑。书法精良，款式雅致。价较别格外廉宜。更有新到各款信纸、信囊、笔、墨水、纸赂发兑。

（《槟城新报》1895年8月20日）

这是发布于1895年的广告，当中清楚说明了槟城点石斋馆内的作业人员，都是“技艺超绝”的中西名工。他们的业务，主要为商界印刷些书籍和文件，同时也有出售欧洲进口文具等。“驰名各埠”四字，更说明了槟城点石斋的业务范围，不限于槟榔屿。

1895年，槟城点石斋开始涉足大众媒体事业，发行了华文报纸《槟城

新报》，为槟城华社打通了认识岛外世界的大门。这项决定的幕后推手，是林花鐸的幼子——林成辉。

林成辉，字幼煊，于1872年出生槟城。传记说他自幼聪颖，性好孔孟，读书常有心得。虽未尝入读英校，但林氏凭借其才力和语言天分，透过自学而掌握了英文，并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1885年，从义学诵毕群经后，即加入他父亲的点石斋印字馆，充任经理。许是孔孟学风的影响，林氏抱有经世济民、熏陶俗风之志。适林花鐸创点石斋后，常有刊印劝世文件派赠各界之举，但林成辉不以为然。他认为，要真正做到开通风气，启迪民智，则非办报纸不成。于是他向父亲提出这个想法，林花鐸大力支持，遂有了《槟城新报》的发行，并由林成辉主事。后来于1900年发行的马来报*Chahyah Pulau Pinang*以及1903年创办的英文报*Straits Echo*，也是首度由华人经营的外文媒体，亦是经他所推动发行。（林博爱1923：139；林博爱1924：232；Arnold Wright 1908：260；Loh Wei Leng 2013：121-122）

1890年代的林成辉不过是20多岁的年轻人，但这里足见其高瞻远瞩，以推广文化事业为己任，他不遗余力地为各族群构筑沟通彼此和世界的桥梁，对本地文化付出了巨大贡献。

《槟城新报》的发行，除了出于启迪民智的考虑外，观察其创刊的时间点——1895年，应还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意义。不过在进入讨论之前，应先稍微澄清这份报纸创刊时间的问题。

关于《槟城新报》创刊时间，据笔者所见各种文献，有作1888年（林博爱1924：232）、1894年（Arnold Wright 1908：259；Loh Wei Leng 2013：118）、1895年（王慷鼎1996：170）、1896年（关楚璞1940：862）等各种说法。即便是《槟城新报》本身，却亦给出了1895年和1896年两种说法。如检索1923年11月20日的报纸，其第1版报眉的位置标示着报纸创刊于1895年8月8日。但4年后，却变为1896年7月29日。这就让人混淆，其真正的创刊年日究竟是什么时候。

要解答这个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是翻查回《槟城新报》的创刊号即可。只可惜这一天的报纸已散佚。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藏最早的《槟城新报》，乃发行于1895年8月10日。这一天的报纸，并未标示出刊号。直

到8月15日的报纸，方标出“第四号”的字样。起初的《槟城新报》为双日刊，每周二、四、六发行。循此逆推，8月10日（星期六）的报纸该为第二号。而创刊号，则应为8月8日（星期四）。海峡殖民地政府注册记录可以作为旁证（SSGG 1896: 73）。故此我们可以断定，《槟城新报》的创刊日，乃1895年8月8日。

在《槟城新报》出现以前，槟城本地可以作为官方喉舌的只有一家英文新闻媒体，即前文提到的*Pinang Gazette*。当时槟城华社若要得知最新的官方以及中外消息，仅能依靠该报。然而并非所有生活在岛上的华民都通晓英语。对此问题，殖民政府亦会发布中文告示，但成效不彰。⁶

在中文报纸方面，据说在《槟城新报》之前曾出现过两种报纸，一为邱义论所创之《华洋新报》，一为邱赞佳发行之《屿报》。《华洋新报》约发行于1885年，主编为浙江童念祖，因舆论触犯时忌，故很快即被政府中止发行。《屿报》比《槟城新报》早八个月创刊，约于1895年初发行，一年后停刊，原因不详（《星报》1898年6月22日）。⁷ 其它还有《叻报》（1881-1932）和《星报》（1890-1898），但这俩家报纸都发行于新加坡，虽槟城有代理商，然售量有限，购阅不便。

19世纪末是政治和思想都极为动荡的时代，诚如李鸿章所谓：“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1980：11）。帝国殖民主义的盛行，以致全球各地均处于紧张的局势。如70年代的普法战争，离海峡殖民地最近的荷兰亚齐战争，80年代的中法战争，还有90年代最引人瞩目的中日战争。尤其这场爆发于1894年的甲午之战，这场攸关中华帝国尊严的战事，向来心系祖国的海外华侨无不给予热切关注（朱自存1998：12）。但在那缺乏新闻纸可以互通消息的槟城，根本未能即时掌握中日战争的最新动态。而对于岛外世界的样貌，种种现代化的科学新知以及中外思潮等，当外面世界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快速发展变化之际，槟城岛上的华人却犹如与世隔绝般，不轻易得知全球情势的最新演变。

在这种背景之下，为了让槟城华社能够与世界接轨，让百姓得以接受新知以及让本地与岛外的地方可以互通消息，则拥有属于本地的中文报纸是亟需的。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说，作为本地一家各式印刷机器齐全，“驰名各埠”的槟城点石斋，发行报纸自是事半功倍的事，也显得顺理成章。万事俱备，再加上有志于启迪民智的林成辉之推动下，《槟城新报》于是乎应运而生。

《槟城新报》的形式，起初为双日刊，采石印印刷，至1896年4月末改用铅字排印。同年7月中旬，报纸改作日报发行。价格方面，据1895年的《阅报声明》，报纸每份售价1角，全年订阅者收费10元。1896年7月27日起，报纸每份降价为5分，全年订阅价格不变。版面内容，主要有：论说、上谕恭录、西报译登、电报译登、中国各地（主要为京城、闽粤）消息、本地新闻、告白、货价船期等。首页版面还有目录栏，使读者一目了然该日报所刊登的内容，不过只持续至1900年新春为止。除此以外，偶尔也会刊登些诗词、粤讴、游戏文章等作品。

1905年8月2日，报纸进行了改版，增设了“益智录”副刊，这是马来亚中文报界最早的副刊形式。取名“益智”，想是蕴含增益读者智慧的寓意，与晚清中国“启迪民智”的思潮相呼应。“益智录”曾刊登的内容有：小说、丛谈、游戏文章、杂文、谐文、杂俎、瀛海琐闻、旧事谐谈、笑林、科学拾零、世界奇闻等栏目。进入1911年以后，“益智录”的版名直接消失，但其版面仍然保留。总括来看，“益智录”长期存在的栏目主要为小说、词章、谈丛、杂文等。尤其谈丛，几乎每日都会出现。谈丛的题材包括万象，举凡各种中外奇闻异事、科学新知、名人传记、谜语，有时甚至读者来稿的诗文创作等，也可成为“谈”的内容。

《槟城新报》版面内容的信息来源，主要来自各地访事员、电报系统、各国地方报纸等（王慷鼎1996：177）。试以1895年8月10日的报纸为例：当时适逢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后不久，中国为了偿付巨额赔款，须向外国筹措款项，《槟城新报》这天报导了一则《中俄要议》，揭示“中俄借款已经成议”。这个消息，是从上海《文汇报》转载而来。《台峴军情》报导了台湾日军南下，中途与刘永福军队相遇的消息，编辑说明是接获“台湾来信”。《重整海军》则报导了北洋海军近况，消息来自天津访事人。《瀛岛近闻》报导了西班牙新派驻日公使抵达日本，这是从东京

电报得到的消息。《虎口余生》报导了荷属怡里埠的裕兴公司附近有老虎出没，消息来自怡里访事人。透过这几则新闻，我们大致可看到甫创初期之《槟城新报》的消息网络，已经遍布上海、天津、台湾、东京、荷属东印度等一带。

尚可注意的还有《槟城新报》转载的文艺内容，与上海报刊的密切关系。大约从1897年10月开始，《槟城新报》即开始偶尔登载上海著名小报《游戏报》的内容。单是10月，就先后刊有《套联》（10月9日）、《诗谑》（10月19日）、《试卷新诗》（10月22日）三则。《套联》嘲讽上海妓院林立，“娼优龟鸨骗嫖客牵头”的现象。《诗谑》旨在戏谑毫无山林之概的酒肉僧人。《试卷新诗》则颇有“色字头上一把刀”的劝诫意味。

《槟城新报》刊登这三则游戏内容，看起来皆意有所指，特别针对槟城的“红灯区”文化以及当地不安本分的僧人而发。除了出于补白的意图，报馆编辑似乎欲藉由转载这类游戏文章，以间接达到针砭和化导社会文化风气的目的。此外，1905年增设“益智录”文艺版面后，可以发现上面登载的小说，有不少是从上海《申报》转载。上海文艺跨域槟城的传播表现，颇可反映《槟城新报》编辑之取材标准和文艺趣味，同时也反映出槟城当地读者市场所接受到的文艺养分（江剑聪2021：497-502）。

关于《槟城新报》的编辑群，据王慷鼎的考察，主要都是中国南来文人（王慷鼎1997：171-180）。报纸甫创初期，林成辉从福建聘请力铎来担任《槟城新报》主笔（《叻报》1895年8月13日）。对于力氏的事迹我们所知不多，只知他号艾生，福建永泰人，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为力钧（1856-1925）的弟弟（金章1922：28）。力钧尝于1891年旅游南洋，在槟城短暂逗留三个月，并写下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槟榔屿志略》。许是力钧的引荐，加上都是同乡关系，故林成辉找到刚考获举人不久的力铎来担主持报刊的重任。除了力氏，就目前所知，尚有何渔古、碌碌子、黄佣绅、韦敬斋、罗颐庵、徐圆阳、徐季钧、子木等曾先后出任编辑职（王慷鼎1997：171-180）。基本上这些南来文人的任职时间并不长，主笔位置没几年就会更换。殊为一致的是，这些南来文人在报纸上发表的社论，均与中国时局、民族主义或儒家文化推广密切相关。这里试以“孔教”例

子说明之。

早期担任报纸笔政的南来文人，在推广儒家思想方面，可谓不遗余力。⁸进入二十世纪初，此风尤为激烈。“孔教”、“圣教”、“圣庙”、“孔庙”等，几乎是这个时期的关键词。⁹众所周知，清末民初最积极鼓吹孔教思想的人，非康有为（1858-1927）莫属。辛亥革命以前，《槟城新报》的政治立场，与康氏的维新思想最为契合。先是康氏在1896年1月成立强学会，创办《强学报》，这个消息很快就被转载到《槟城新报》上（《槟城新报》1896年2月1日）。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氏流亡海外，曾一度到访槟城。槟城当地绅商，包括槟城点石斋主人林花鐸和林成辉父子，都对这名“伟人”表示热烈欢迎。康氏受邀到不同地方发表演说，足迹所至，可谓万人空巷，《槟城新报》亦有大肆报导。¹⁰从中可见《槟城新报》立场之一斑。

康有为的孔教论，背后蕴含“保种强国”的政治目的（许明珠2010）。这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的思想，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对槟城产生了重要影响。如1904年，槟城绅商倡议成立孔教，就是出于“保种强国”意识（《槟城新报》1904年5月30日）。同年，从孔教的尊崇，《槟城新报》社论又进而有孔庙建设之议（《槟城新报》1904年8月23日）。此后几年，孔教在当地的呼声逐渐扩大，筹建孔庙行动在1911年10月达到最高潮（廖小菁2020：208），最终更形成了当地华社的节日庆典——圣诞。1908年，《槟城新报》报导了当地华社庆祝孔诞的盛况，新闻记者不忘附和道：“强国必先强种，而强种则首在改良风俗。风俗之移易，又非尊崇圣教、改良教育不为功。”（《槟城新报》1908年9月22日）当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南洋华侨无不热切关注这场政治走势，而与此同时，槟岛“于孔子圣诞之日，莫不熙熙焉休业，悬旗同申庆祝，行见圣教之典，如日中天。”（《槟城新报》1911年10月19日）足见“孔教”在槟城影响之深。

总之，《槟城新报》长期以来孜孜于“孔教”的渲染，加上名人鼓吹以及槟城绅商的积极响应，确然已逐步渗透到槟城华社各阶层，并持续扩大其影响范围，最终构成当地华人文化的一部分，如孔圣诞的庆典，以及

槟城孔圣庙中华学校，就是这方面的显著成果（廖小菁2020：193-226）。

最后可以略为一提的，是《槟城新报》的外地销售范围。据1895年8月的报纸，其《外埠代理芳名》所提到的地方，分别有：仰光、厦门、新嘉坡、吉莪（吉隆坡）、安顺（Anson，霹雳州城镇）、务边（Gopeng，霹雳州城镇）、甲板（Papan，霹雳州城镇）、喼哈（Lahat，霹雳州城镇）、小吡叻（霹雳）、日里（Deli，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峇里（Binjai，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棉兰（Medan，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亚沙汉（Asahan，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直民丁宜（Tebing Tinggi，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笼葛（Langkat，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叻扣（Tongkah，今泰国普吉岛）等。可见其销售网络除了新马一带，还遍布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中国等地方。

四、跨越族群和语言：外文报纸的创办

（一）马来报：*Chahyah Pulau Pinang*

林成辉所经营之槟城点石斋的报刊事业，不止为华社计。许是有见于《槟城新报》的发行成效不俗，林氏将其事业扩展到了马来市场。1900年，槟城点石斋先后发行了以爪夷文为媒介语的马来报纸*Bintang Timor*和*Chahyah Pulau Pinang*。尤以后者的影响最广。要知两份报纸出现的意义，我们先该大致了解马来报在槟城的历史发展。

学者尝对马来亚马来报界的发展分成不同的阶段，以1876年滥觞于新加坡的*Jawi Peranakan*（1876-1895）为始点，至1905为止，为第一阶段（Mohd. Dahari Othman 1979: 115）。这一阶段的马来报多数发行于新加坡，其他则为槟城以及霹雳。与本文相关的槟城，共有5种马来报在此阶段发行。最早的一份马来报纸，为*Tanjung Penegeri*，发行于1894年10月。紧接其后则有*Pemimpin Warta*，发行于1895年11月。这两份报纸的寿命极其短暂，发行不久即停刊。1900年，又陆续有*Bintang Timor*（槟城点石斋）、*Lengkongan Bulan*以及*Chahyah Pulau Pinang*（槟城点石斋）三种马

来报诞生。前两种报纸的发行时间同样并不长。*Bintang Timor*创刊于1900年3月，半年后就停刊。*Lengkongan Bulan*与前者差不多同时，创刊于同年4月，一样发行未满一年即宣告结束（Hamed Mohd Adnan 2015: 4-5）。*Chahyah Pulau Pinang*的出现虽最晚，然其发行时间为最久，从1900年10月13日始，至1908年3月28日止，维持了近7年半的时间。从槟城暨马来马来报的历史发展来看，*Chahyah Pulau Pinang*可以说具有承先启后的先驱意义，它不仅是20世纪初（1901-1908）在槟城唯一发行的马来报纸（Arnold Wright 1908: 259），同时也是各地马来学校的指定读物，深受马来知识分子的重视。

槟城点石斋并非华人发行马来报的首例。上述*Pemimpin Warta*（1895），就由另一家华人印刷机构金石轩（Kim Sek Hean Press）所发行。¹¹而槟城点石斋跨足马来读者市场的尝试，渊源于*Bintang Timor*这份报纸。

根据海峡殖民地官报的记录，*Bintang Timor*的业主和主编，都是Abdul Ghani bin Mohd. Kassim，槟城点石斋仅作为印刷和发行单位。报纸为周报形式，每周印刷54份（SSGG 1900: 1639）。这样的印刷量，可能即导致其仅撑了半年就被迫停刊的命运。后来报纸版权转移给了槟城点石斋，进行重组后，遂有了*Chahyah Pulau Pinang*的面世。

槟城点石斋接手这份马来报纸，可谓是“大胆”的决定。有前车可鉴，在槟城发行马来报，是无利可图的文化事业，随时血本无归。先前发行的几份报纸，几乎都是惨淡收场。缺乏读者和经费维持是造成这个结果的症结。传统马来社会较为注重父子相传的行业技术和生活技能的获取，对于教育并不太重视（廖文辉2017: 276）。因此普遍来说马来社群的文化水平不高。当时发行马来报纸，主要服务对象应该还是受过教育的马来精英以及英国政府所办的马来学校。与华人、欧洲人的读者市场相比，马来读者市场显得薄弱许多。

槟城点石斋发行*Chahyah Pulau Pinang*，似乎非为谋利起见。1903年12月，槟城点石斋曾致函雪兰莪殖民政府（OFA 1957/0113174W），盖雪兰莪殖民政府先前拒绝订阅*Chahyah Pulau Pinang*，槟城点石斋为此请求政府重新考虑这项决定。信函内容中，槟城点石斋指出公司曾与霹雳

（Perak）、森美兰（Negeri Sembilan）政府协商，给予各埠马来学校较为优惠的年度订阅价格。信中说明各埠马来学校的年度订阅价格为100元，每间学校获得寄送的报纸数量为50份，且免邮费。若换成一份来计算，平均年度订阅价格为2元。

一般大众则没有如此优惠的价格。据槟城点石斋刊登在英文报纸的广告（SE 1903年6月2日），一般大众欲订阅*Chahyah Pulau Pinang*，年度订阅价为5元，外加邮费6元，共11元。相较之下，马来学校确实获得极为优惠的价格。

槟城点石斋在信函中表示雪兰莪政府应该着眼于提升马来学生的知识，而非因开支预算而拒绝订阅马来报。其也明确指出，槟城点石斋的目标是希望*Chahyah Pulau Pinang*能够广为人知，而非从金钱利润起见，因为其所给予马来学校的订阅价格，根本很难支付报馆的日常开支。

就此推论，谋利并非促使槟城点石斋发行*Chahyah Pulau Pinang*的第一目的，这背后的推动力，更多是一种文化使命和理想所使然，志在为马来社会和学校开通风气。¹²

Mohd. Dahari Othman和Hamed Mohd Adnan尝对*Chahyah Pulau Pinang*的内容作过考察，以下有关这份报纸的讨论，多出自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Mohd. Dahari Othman 1979: 115-121; Hamed Mohd Adnan 2015: 5, 33-35）。

*Chahyah Pulau Pinang*采周报形式于每周六发行。报纸共4页，每份售价15分钱，高于《槟城新报》三倍价格。报纸主编先后由Abdul Ghani bin Mohd. Kassim以及Mohd. Arif bin Hussin Khan这两位土生爪夷人（jawi peranakan）担任。前者即报纸前身*Bintang Timor*原主，他也尝在新加坡*Jawi Peranakan*报社服务。报刊宗旨延续前身的口号，标榜“纯粹真实的报导”（Semata-mata Benar Perkhabarkan）。新闻内容方面，主要聚焦在西亚国家的消息，如土耳其、伊朗、埃及等，这些都与伊斯兰文化圈具有关系。其他如欧美、中亚（中国、日本、印度）、东南亚（马来亚、爪哇、苏门答腊）地区方面，报纸亦有给予报导。这些新闻来源，应该与《槟城新报》的消息网络互通声息。

槟城点石斋发行的这份马来周报，社论很晚才出现，大约在1904年末，且不过偶尔刊登，栏位也不固定。这与社论在《槟城新报》或其他一般报纸所扮演的重要固定角色形成明显对比。这很可能与主编风格有关，Abdul Ghani bin Mohd. Kassim原先主持的*Bintang Timor*，社论是阙如的（Hamed Mohd Adnan 2015: 4）。因此*Chahyah Pulau Pinang*有超过一半时间没有出现社论栏目，并不太奇怪。后来偶尔刊登的社论内容，主要针对时事作出评论，鲜少触及马来人政治、经济或宗教等层面的问题。¹³ 这点也与《槟城新报》社论那股满溢的民族主义气息殊致。可见槟城点石斋对于马来报纸内容，并没有给予太多干预，大多数交由主编发挥。

然而作为马来报的业主，槟城点石斋对于*Chahyah Pulau Pinang*也有呈现出其影响力，形成这份报纸的标志性特色，那就是刊登在布满爪夷文版面上的欧洲和中国商品广告。这在马来报界实属创举。马来报纸与外国产品广告的合作模式要到1920年代才开始普遍（Sarena Abdullah 2018: 62）。而*Chahyah Pulau Pinang*在1900年就率先做了示范。我们会发现，在这份马来报纸上面有些广告图和字样跟《槟城新报》的广告如出一辙（见下图）。显然是直接从中文报纸转载。广告是报纸的重要收入来源，借鉴于中文报纸的经营模式，槟城点石斋不忘将这种能够“营利”的版面运用到了其所发行的马来报纸上。*Chahyah Pulau Pinang*能够维持长达七年半，这些广告功不可没。

CHAHYAH PULAU PINANG.

1904, 12th FEBRUARY, 1904.

Nestlé's Milk

Chahyah Pulau Pinang版面牛乳广告，图片摘自Sarena Abdullah (2018: 64)。

EXPORT-BREWERY PILSENER BEER

Nestlé's Milk

1904年2月13日

1904年2月13日《檳城新报》牛乳广告。

关于Chahyah Pulau Pinang的销售范围，据1903年报纸上所列出的代理商，当中分别有：吉隆坡、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吉打（Kedah）、麻坡（Muar）、玻璃市（Perlis）、安顺、华都牙也（Batu Gajah）、新加坡等横跨马来亚北、中、南地区。国外代理商则有亚齐。1908年又扩展到马六甲、吉兰丹（Kelantan）、山打根（Sandakan）等马来亚东海岸及东马地区。这份报纸还受到官方马来学校的青睐，定期订阅作为学生阅读的刊物。其所遍布的读者群不可谓不广。

（二）英文报：Straits Echo

1902年，檳城点石斋注册为有限公司。而立之年的林成辉继承父业，出任总理，正式成为檳城点石斋的主事者。继中文报及马来报创办后，在传播行业算是略有成绩的林氏，有感于西人不甚重视华社舆论，殖民政府

和华人百姓常出现沟通上的误解和难题，关系不甚融洽（林博愛1923：139）。为此，于1903年6月1日，经过各方筹谋，槟城点石斋发行了首度由华人营运的英文报纸*Straits Echo*。当时中文译作《亦果西报》（《槟城新报》1903年6月5日）。

观察这份英文报命名，与前两份特别突显“槟城”地域性的华、巫报不同，*Straits*——海峡，说明其眼界不限于槟城，而宏观至整个海峡殖民地；*Echo*——回声，背后蕴含促进公众舆论的寓意。

如前文所述，在此之前，槟城只有*Pinang Gazette*这一家由欧洲人所经营的英文报纸。在那殖民主义当道的时期，舆论基本由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政府所垄断，其他族群的声音或需求鲜少获得重视。早在1889年，新加坡《叻報》就曾批评这份报纸“所持之论，则尊视西人而卑视华人”的问题（《叻报》1889年12月20日）。这对于多元社会的公共舆论以及族群和谐的进展上来说显然是不利的。《亦果西报》的诞生，即想扭转这种局面。

在创刊号刊登的开宗明义文章〈《亦果西报》的存在理由〉（“*The Raison D’etre of the Straits Echo*”）当中，作者清楚表达了这份报纸的理念——为海峡殖民地以及毗邻的地方建立一个健康（*healthy*）、自由（*free*）和独立（*independent*）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同时严格遵循公正（*Justice*）、公平（*Fairplay*）的价值观，为一切不公不义之事发声，成为无所畏惧的公众舆论代表（*SE* 1903年6月1日）。颇有为马来半岛打造一良好公众舆论平台暨促进各族平等的态势。相较于槟城点石斋先前发行的华文报及马来报，其眼光和格局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亦果西报》采日报形式发行，每份售价1角，全年订阅24元。起初报纸有6页，后来增添为8页。从创刊号的版面来看，内容主要有：社论、电报消息、各国新闻、广告以及货价船期等。基本上与中文报纸无异，惟社论和广告的量上超乎前者。当天的社论，除了上引开宗明义文章，尚有其他涉及海峡殖民地行政、教育、设施等议题的专栏文字。在创刊号还曾出现一个“中国谚语”（*Chinese Proverbs*）栏目，向读者介绍了如“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If the roots be left, the grass will grow again*）；

“毋临渴而掘井” (Dig a well before you are thirsty);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One lash to a good horse, one word to a wise man) 等等中国俗谚，用意是给外国读者认识华人的思维模式。不过，这个栏目后来就鲜少出现。《亦果西报》后来陆续增添了新的栏目，如长期登载各种运动比赛的动态和消息。众多栏目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公众舆论” (Public Opinion) 专栏。这里专门刊登读者来信，让他们可以针对生活时事或公众利益等各种议题，提出建议和批评 (SE 1903年7月13日)。

有趣的是，为了打造新报纸的声势以及制造更多舆论，《亦果西报》甫创即发起了选美比赛，让全民参与投票，选出马来亚“最帅男性”，最高票者将获赠100元奖金。编辑在创刊号《选美公告》中指出，要将“究竟谁是槟城和马来联邦最帅的人”这个问题，交由“公众舆论”来决定。公告一出，确实引起了热烈反应，“公众舆论”栏位不时会刊登读者对这个比赛的意见和观感，副编辑也会适时做出一些回应 (见SE 1903年6月23日、6月25日、6月26日、6月29日、7月3日)。这次比赛共收到5,545读者投票，选出了126位男性。最高票者为J. Napier，获1,478张票；其次为林耀椿，获1,443票 (J. Napier原被登记为1,378票，后更正为1478票。见SE 1903年7月4日、7月5日)。

颇可注意的是，《亦果西报》与《槟城新报》互通声息的情况。通常第一手外国电报消息，先见于英报，方出现在其他语种报纸。再以创刊号为例：这天刊登了几则电报新闻，如马尼拉火警 (Appalling Fire in Manila)、美国水灾 (Terrible Floods in the U.S.A)、香港授勋典礼 (Decorations for Hongkongites) 等 (SE 1903年6月1日)。这些新闻后来皆登载在同年6月3日的《槟城新报》上。这种优先性说明槟城点石斋对《亦果西报》新闻即时性的特别重视。当时为了这份新创英文报纸，槟城点石斋“不惜糜费各处多购专电，消息愈为灵通” (《槟城新报》6月5日)。因此槟城点石斋发行的几种报纸，对于国际新闻的动态，从即时性和广泛性来说，《亦果西报》为最。据说早期南洋各华文报的国际新闻，也是透过《亦果西报》转载翻译，足见其影响力 (林博爱1923: 139)。

华人要在英殖民地发行英文报纸，与官方喉舌分庭抗礼，甚至公然

挑战政府舆论，绝非易事。据1908年时人观察，《亦果西报》被誉为“人民之报”（people's paper），可见其短短几年即在当时社会引起良好“回声”（Arnold Wright 1908: 259）。能够交出亮眼的成绩，与槟城点石斋雇用的编辑群不无关系。

《亦果西报》创办那年，槟城点石斋聘请到尝在香港《士蔑报》（*Hongkong Telegraph*）服务，在当时颇有知名度的新闻工作者Chesney Duncan（1854-?）来出任主编。《〈亦果西报〉的存在理由》即出自他的手笔。Duncan曾游历亚洲各地，深悉远东局势（Arnold Wright 1908: 262），加上多年的报馆工作经验，故在其主持下，槟城点石斋这份新兴的报纸可谓获得超乎预期的成功。但到了1906年5月，由于跟槟城点石斋董事会出现理念分歧，Duncan离开了报馆，他的位置后来由副编辑E. F. Skertchly顶替。Skertchly同样曾在《士蔑报》服务，1902年离开香港后任职于槟城*Pinang Gazette*报馆（*TST* 1902年6月13日），后来转到《亦果西报》担任编辑。然而坐上主编位子不久，Skertchly一年后即因患上脑膜炎而逝世（Arnold Wright 1908: 260）。James Thomas Dobbie（1877-?）也是早期《亦果西报》编辑之一。他于20世纪初先在泰国曼谷担任某报馆采访主任和编辑，1904年9月始加入《亦果西报》，1905年2月出任副编辑，但半年后即离开转职*Pinang Gazette*（*WFE* 1906: 354-355）。以上这几位欧洲人，都是具有丰富的新闻工作背景，对《亦果西报》早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07年，Skertchly去世后，槟城点石斋把英文报纸主编这个重要担子，首度交托一位槟城华人手中，他就是翁木火（Ung Bok Hoey）。翁氏在1905年始加入《亦果西报》编辑群，是当中唯一的本地华人，有见于其身分的特殊性，以下稍微交代其事迹。

翁木火出生于1874年¹⁴，早年接受英文教育，就读于槟城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1893年，翁氏凭借优异的表现，获得了海峡殖民政府颁发“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s*），¹⁵于该年8月前往英国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深造，后来进入中殿律师学院（*the Middle Temple*）攻读法律。1900年学成返回槟城后，翁氏有泰国南部之行，在

拉廊（Renong）担任政府机关的英文书记。1905年1月，翁氏接受槟城点石斋之聘，再次返回家乡担任点石斋的书记兼负责《亦果西报》的发行业务。同年5月，翁氏晋升为报务经理，几个月后又受委派身兼《亦果西报》副编辑。

同年7月，李登辉（1872-1947）等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士在上海发起了寰球中国学生会（World Chinese Student's Federation）。翁木火与同样具有欧洲留学背景的伍连德（1879-1960）、辜立亭（1875-1956）等亦响应上海这个学生组织，在槟城设立分会。由伍氏担任主席，翁氏任书记，辜氏任财政。¹⁶《亦果西报》曾隆重其事地刊登了李登辉致华人的一篇公开信（SE 1905年9月4日）。可见翁氏在处理报务之余，亦不忘关心中国政治情势，且透过实际行动参与其中。

1907年，时任《亦果西报》主编的Skertchly因病离世，翁氏被公司钦点继任这份“人民之报”编辑群的掌舵人，成为了槟城英文报界首位华人主编（翁木火生平见Arnold Wright 1908: 260）。直到两年后Tom Wright加入《亦果西报》，翁氏才让贤，继续退居幕后直到辛亥革命左右离开报馆为止。¹⁷

最后可以略微一提《亦果西报》的政治立场和之后引发的一些影响，以作为本节之结束。

如前文所揭，槟城点石斋的立场与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最为亲近。对于以孙文（1866-1925）为首的革命派，槟城点石斋原则上持反对立场。1910年11月，当时身在槟城的孙文，与革命党人召开了著名的“庇能会议”，准备策划“黄花岗起义”。在这期间，孙氏曾在槟城清芳阁发表演讲。据颜清湟研究指出，孙氏这次的演说，“不只发言要求群众支持中国革命，反对与英国建有外交关系的满清政府，而且也间接地攻击了英人在马来亚的殖民政策”（颜清湟1982: 269）。孙氏演说辞后来刊登在《槟城新报》，并译成英文转载到《亦果西报》。后者更赋予严厉批评，讥讽孙氏惟钱是图，为一“无革命行动的革命家”（SE 1910年11月2日）。此论一出，护主心切的革命支持者，赶紧在*Pinang Gazette*发表文章予以反击，一时之间燃起了两家英文报纸之间的笔战（Salma Nasution Khoo 2008:

56)。这次的冲突也更加让槟城革命党人意识到报纸机关的重要性。惟英语市场难以攻入，需从华人市场寻找机会。《槟城新报》垄断华人读者市场的现象非常不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为此，槟城革命派人士很快地将原本在仰光发行后来停办的《光华日报》，转移至槟城重启，于同年12月20日开始发行，从此形成了两家立场不同之华文报纸双峰对峙的局面。

五、结论

本文从槟城印刷机构发展历史的角度，说明了槟城点石斋出现的特殊意义，其打破了这个行业在槟城将近一个世纪由欧洲人所垄断的局面，成为华人印刷事业的重要先驱。这家在1883年由槟城福建侨商林花鐸所创办的石印印刷机构，事实上与中国石印行业崛起的潮流息息相关。上海点石斋在中国获得的巨大成功，除了引领起石印书局的创办风潮，其余绪还波及了南洋一带，使林花鐸意识到此商机在槟城落实的可能性。林氏将上海石印行业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品牌——点石斋，“复制”到了槟城，创设了这家对日后本地知识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力的点石斋印字馆。

创设后的第一个10年，其业务内容主要为承印各种语言的商业文件，出售欧洲进口文具等。而服务的对象，大多为政府部门和商界。这与上海点石斋致力于出版石印书籍、书画艺术品和后来风行全国的《点石斋画报》等知识文化传播表现截然不同。因此，回应前言所提出的问题，槟城点石斋与上海点石斋之间的影响或继承关系，若从第一个10年的迹象来说，仅止于前者对后者文化品牌和石印技术的“复制”，在槟城仅作为一家营利印刷机构。直到林成辉的加入，槟城点石斋方有突破性之举。

1895年，经林成辉这位有志改革地方风气之年轻人的献议，槟城点石斋从纯商业性质的营利机构，开始拓展到大众媒体文化事业，发行了第一份华文报纸《槟城新报》。本文指出这份报纸的面世，除了出于启迪民智和开通风气的考虑外，还与19世纪末的世界动荡时局，槟岛华社亟需华文报纸以跟外面世界（尤其中国）互通声息的背景有莫大关系。槟城点石斋采用的南来文人编辑群，确实朝着上述目标前进，除了新闻报导，还藉由

转载上海文艺报内容来达到针砭和化导社会风气的目的。同时,也使《槟城新报》反映出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进入20世纪初,报纸所积极渲染的“孔教”图景,确实渗透到槟城华社各阶层,最终构成槟城华社的重要庆典。当中国辛亥革命正如火如荼上演之际,另一隅的南洋华人却正悬旗欢庆孔诞,形成强烈对比。

1900年,槟城点石斋做了“大胆”暨极具投资风险的决定,跨越族群和语言,发行了当时采用爪夷文为媒介语的马来报纸*Bintang Timor*及*Chahyah Pulau Pinang*。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属于槟城点石斋经营的第2份报纸。作为马来报发展第一阶段的一员,*Chahyah Pulau Pinang*难能可贵之处,即在马来市场存世长达7年半之久。以当时的环境来说这已算是“成功”的案例。*Chahyah Pulau Pinang*于20世纪初能够屹立不倒,或仰赖“驰名各埠”的槟城点石斋这近二十年来所累积的资本,包括《槟城新报》以及广告的收入,使这份马来报纸能够勉强经营。这份周报的新闻特色,特别聚焦在伊斯兰文化圈的消息,社论很晚才出现,且主要涉及时事评论,而鲜少触及马来政治、宗教或经济层面的民族问题。这一方面表现出当时马来主编的编辑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一般马来报纸的风气。

1903年,槟城点石斋再次做了跨族群、语言的尝试,且这次有更宏观的理念,欲为身处英殖民地的华人发声,同时促进海峡殖民地的公众舆论,为此发行了第三种报纸《亦果西报》。槟城点石斋发行这份英文报,放置在英殖民地的背景以及槟城英文报界发展来看益显其特殊性。槟城自1786年开埠以来,舆论基本由欧洲人所掌控和垄断,截至1903年为止,岛上仅通行*Pinang Gazette*一家英文报纸。虽然殖民政府允许其它族群语言的媒体通行,然无论是华文、马来文或淡米尔文(Tamil)报刊,多数只是为各自的族群服务,并未做到有效的公共对话和交流。尤为关键的,是各族群的声音或需求,往往未能获得英殖民政府的重视。《亦果西报》的诞生,即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并旨在打造一个能够促进族群平等和谐的公众舆论平台。特别开辟“公众舆论”栏位让各方读者发表意见,可见《亦果西报》的改革决心。然可不必讳言的是,林成辉发行这份英文报纸的初衷,主要还是先从华社福祉角度出发。而Chesney Duncan等具有亚洲视野

和丰富新闻工作背景的加盟，包括具有欧洲留学背景的槟城华人翁木火的加入，在这些人的主持下，《亦果西报》很快即在当时取得巨大成功，被誉为“人民之报”。

如果从商业营利的角度衡诸槟城点石斋三种报纸的成果，仅《槟城新报》堪称“有利可图”。*Chahyah Pulau Pinang*从发行以来都只是勉强经营，无利润可言，后来《亦果西报》的创办，同样也是亏本经营，这更使马来报刊维持得更为艰辛。面临鱼与熊掌的抉择，槟城点石斋最终不得不选择结束苦心经营了7年半的*Chahyah Pulau Pinang*，把资金专注投入于具有更大使命之中、西报的营运。据1914年的记录，槟城点石斋从1912年至1914年的营业额，扣除总开销，共赚1906元5角2仙。其中，《槟城新报》获利521元2角2仙，约占利润三成，是公司的重要收益。《亦果西报》则尚亏本150元8角9仙（《槟城新报》1914年4月2日）。当时《亦果西报》发行已达十年，仍然没有回本，可知当时槟城点石斋经营这份“人民之报”的不容易。

从槟城暨马来亚文化进程的角度来说，槟城点石斋发行的三种报纸，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确实对马来亚的知识传播、舆论发展和争取族群平等方面贡献良多，但亦同样存在某些局限。

尝任槟榔屿副领事的张煜南（1851-1911），在其1898年所编的《海国公余辑略》中，收录了一首诗颇可说明当时槟城华社对《槟城新报》的观感，其云：“新闻络绎缀成篇，石印分明玉版笺，中外流行无间阻，看须一日一回钱”。张氏按语曰：“新闻纸流行中外，屿中阅视者多人”（张煜南1898：42上）。可知这份华文报纸确实对当时的文化风气起到良好作用。然而另一方面，从1895年至1910年这十五年的时间，因岛上只有一纸风行，华社舆论基本由《槟城新报》所垄断。此时华社接受到的知识讯息，基本都是倾向维新派立场的内容，这对于当地华人思想不免构成一种偏狭局限。待到革命机关的《光华日报》的出现，这种情况方有所改善，且在民国以后形成思想冲击而迸发各种火花的对峙风景。

槟城点石斋的文化事业，为我们展示了开放包容的理想图景。虽作为一家华人印刷机构，然其同时做到跳脱本位主义，跨越族群和语言，为其

他族群服务，甚至有心为海峡殖民地建构一健康、自由和独立的公众舆论平台。除了报刊发行外，槟城点石斋亦出版过各种语言书籍，在出版文化方面另有一番建树，其中值得留意的如1920年代与《光华日报》编辑群携手编辑出版的《南洋名人集传》。槟城点石斋的表现和其中所蕴含的意义都值得后人继续深入发掘和研究。

注释

- 1 有关上海点石斋印书馆的生产活动，可参张伟（2014）、沈俊平（2013）。《点石斋画报》研究可参王尔敏（1990）、陈平原（2001）、鲁道夫·瓦格纳（2019）。
- 2 除了报刊发行，Bone亦尝投入于商业应用书籍类的出版工作，如1807年，其出版了*The Prince of Wales Island Directory and Calender*以及*The Malay Language*。前者为一种名录簿，主要包含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马六甲、槟城等企业机构信息，也收录些运输行情以及孟买、孟加拉国等地代理商的信息等。后者则为马来语言学习用书，主要消费对象为在槟榔屿欲学习马来文之欧洲人。（Md. Sidin Ahamad Ishak 1992: 21）
- 3 关于伦敦布道会在马来亚的活动，可参Leona O'Sullivan (1984: 61-104); Ching Su (1996: 97-198)。
- 4 麦都思曾到过槟城数次，但真正在岛上逗留并建立事业是在1820年。参约翰·哈勒戴（2019: 85, 97-115）。
- 5 明显例子如槟城19世纪大企业家邱忠波（1830-1892）和李丕耀（1830-1900）。《槟榔屿志略》提到：“海外商务之大，忠波为最。中国则上海、宁波、厦门、香港、汕头，……有轮船十数艘为之转运，受腹心之寄，任指臂之劳，凡四五千，仰而食者，则不可数计焉。”见力钧《槟榔屿志略》（陈可冀2016: 302）。李丕耀置有崇茂商号，经营船舶运输业，常往来新加坡、香港、厦门、潮汕等处。见林博爱（1925: 343）。力钧《槟榔屿志略》亦提到李氏曾在上海购书。（陈可冀2016: 309）。有关邱、李俩人生平，亦可参Loh Wei Leng (2013: 101-102, 109-110)。
- 6 1889年末，《叻报》报导了一则《屿民惶惑》新闻。内容指出，因殖民政府拟于1890年起落实《危险社团法令》，槟城华社谣传政府“欲将各会头人概行驱逐回华”，导致人心惶惶。记者指出新加坡华人护卫司早已发布中文告示稳定民心，同时也登载于《叻报》上。针对槟城的谣传，《叻报》记者认为“想未能尽见该示之故，然则国家宜将此示再行多印，四处张贴，以安民心。”可见当时槟城华社消息流通之困难。见《叻报》，1889年11月21日。
- 7 据《星报》论说《论南洋宜联报馆以挽颓风》揭示，《华洋新报》终止发行的

原因，乃“是时该埠风气未广，阅者寥寥，数易蟾圆，中道而止”，见《星报》1898年6月22日。关于《华洋新报》编辑方面，在《槟城新报》创刊后几天，新加坡的《叻报》主笔有特别撰文表示支持，其中说到：“十年前有创设《华洋新报》者，延请金陵童君主持笔札，一时耳目为之顿豁。所奈该报开设未久，旋即停歇，人多惜之。”见《报务重兴》，《叻报》，1895年8月13日。又，《槟榔屿志略》提到：“槟城亦有中国报馆，当日主笔为浙江童念祖。开设未久，中止。”童氏因报纸文字触犯时忌而构狱，以致报纸停刊。见陈可冀（2016：319，325）。综合这几条资料，可知大约在1885年之时，槟城曾通行《华洋新报》，主笔为浙江童念祖。

- 8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1895年11月底，槟城发生了一起十岁小孩盗取友人金器的事件，登上了社会新闻。（《槟城新报》1895年11月28日）这件事情大概引起了社会哗然，以致不久，《槟城新报》发表了一篇《答客问性善说》社论，探讨儒家“性善”和“性恶”问题。作者是孟子性善论的支持者，他在文中以宋儒（理学）的理论，驳斥了荀、扬的人性论。其中比较特别的一段，是“客”针对前几日《小孩为盗》的社会新闻向作者提出“性恶”的质疑。作者的回应是：“小孩之所为，触于目而动于心，当其一念之萌，已入物欲之界，安得谓之性哉？凡人之心，但使稍触于物，不必论其事之善恶，皆谓之情，非谓溺于嗜欲而后本性始漓也。”（《槟城新报》1895年12月3日）。
- 9 如《商建孔教中西学堂章程》（《槟城新报》1901年10月17日）；《流寓海外吾华同人宜兴圣教倡设学校培养后进论》，（《槟城新报》1902年1月23日）；《合群倡立孔教会党说》（《槟城新报》1904年4月5日）；《孔教大行于诸国考》（《槟城新报》1902年7月6日-8日）；《论本屿宜建孔圣庙》（《槟城新报》1904年8月23日）；《尊崇孔教》（《槟城新报》1907年10月5日）；《劝捐圣庙说》（《槟城新报》1911年7月31日）。
- 10 见《逋臣到屿》（《槟城新报》1903年7月21日）；《争见伟人》（《槟城新报》1903年7月23日）；《空谷足音》（《槟城新报》1903年7月27日）；《学堂演说》（《槟城新报》1903年8月1日）；《广福礼贤》（《槟城新报》1903年8月4日）。
- 11 *Pemimpin Warta*发行资料见SSGG（1896：75）。另一份报纸*Lengkongan Bulan*，同样印刷于金石轩，见SSGG（1900：1642）。金石轩主人为许朝汉（Khor Teow Han），新加坡敏求斋主人陳省堂在其旅游散文《重游槟城记》曾提到：“许君朝汉招观其所创金石轩印馆，生意甚佳，许君亦善贾也。”（《叻报》1894年6月5日）有关这家印刷机构和业主的详情有待考察。
- 12 由于笔者不谙爪夷文，故未能针对Chahyah Pulau Pinang创刊号内容进行解读和论证，关于林成辉发行这份马来报的目的，目前仅能就所见史料进行推论。
- 13 Mohd. Dahari Othman指出这种现象与1930年代的马来报章情况有如天壤之别。廖文辉指出马来社会最早传播民族主义的报章，是1906年7月23日创刊于新加坡的

- 《领导者》月报。廖氏也说道：“1930年代以前的马来文报章杂志基本上宗教色彩较为浓厚，主要因应以宗教为主导的马来民族主义运动而产生。自1920年代开始，许多马来知识分子和专业记者，投身于马来民族主义运动的洪流中，他们创办的报章就成为马来民族自强与团结的精神堡垒。”见廖文辉（2017：215-216）。
- 14 Arnold Wright在1908年出版的著作中介绍翁木火时说已34岁，循此推算翁氏当出生于1874年。见Arnold Wright（1908：260）。
 - 15 Arnold Wright误作1903年，见Arnold Wright（1908：260）。翁木火是槟城首位获得“女皇奖学金”的华人。在翁氏前，华人只有新加坡的林文庆（1887）和宋旺祥（1888）获得这个奖学金。在翁氏之后的槟城华人，则有辜立亭（1894）以及享誉中外的伍连德（1896）等获得。见Wu Lien Teh, Ng Yok Ying: “The Queen’s Scholarships of Malaya 1885-1948”（TSS 1948年11月16日）。《槟城新报》称此殊荣为“三州府博学幼童”，见《槟城新报》（1896年11月10日）。
 - 16 第一期《寰球中国学生报》刊登了槟城分会会员的合影。见“Officers of World’s Chinese Students’ Federation, Penang Branch”，《寰球中国学生报》第1卷第1期（1906年），未注明页数。
 - 17 据1908年的各国工商名录，《亦果西报》主编仍然为翁木火。见TD 1908（1908：1255）。1909年和1910年的工商名录均作主编为Tom Wright，翁氏头衔改为经理。见TD 1909（1909：1274），TD 1910（1910：1364）。目前未见1911年记录，故不知翁氏此年的职衔实际为何。而1912年的工商名录已不见翁氏名字，可能此前已离开报馆。见TD（1912：1350）。

参考文献

- 《槟城新报》1895年8月20日；1895年8月15日；1895年8月10日；1895年11月28日；1895年12月3日；1896年7月25日；1896年2月1日；1896年11月10日；1897年10月9日；1897年10月19日；1897年10月22日；1901年10月17日；1902年1月23日；1902年7月6日-8日；1903年6月3日；1903年6月5日；1903年7月21日；1903年7月23日；1903年7月27日；1903年8月1日；1903年8月4日；1904年5月30日；1904年8月23日；1904年4月5日；1904年8月23日；1907年10月5日；1908年9月22日；1911年10月19日；1911年7月31日；1912年2月13日；1914年4月2日；1923年11月20日。
- 《叻报》1895年8月13日；1889年12月20日；1889年11月21日；1894年6月5日。
- 《星报》1898年6月22日。
- 《申报》1878年12月31日；1879年2月21日。
- 陈平原2001。〈以“图像”解说“晚清”——《图像晚清》导论〉。《开放时代》：56-65。
- 戈公振2003。《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关楚璞编1940。《星洲十年》第四编。新加坡：星洲日报。
- 《寰球中国学生报》第1卷第1期（1906年）。
- 金章1922。《永泰县志》铅印本。
- 江剑聪2021。〈五四以前的马华报刊文学现象——以《槟城新报》为中心〉。《台北大学中文学报》29：475-512。
- 李鸿章著，吴汝纶编1980。《李文忠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 力钧著，陈可冀编2016。《清末御医力钧文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林博爱等编1923。《南洋名人集传》1。槟城：点石斋。
- 林博爱等编1924。《南洋名人集传》2上。槟城：点石斋。
- 林博爱等编1925。《南洋名人集传》2下。槟城：点石斋。
- 鲁道夫·瓦格纳著，赖芊晔等译2019。《晚清的媒体图像与文化出版事业》。台北：传记文学。
- 廖小菁2020。〈近代南洋的孔教运动与华文教育——以槟榔屿孔圣庙中华学校为中心的考察（1904-1923）〉。载《五四运动与中国宗教的调适与发展》。吕妙芬、康豹编。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 廖文辉2011。〈早期新马地区东南亚研究英文文献概述（1800-1876）〉。《台湾东南亚学刊》8：127-160。
- 廖文辉2017。《马来西亚史》。雪兰莪：马来亚文化事业。
- 沈俊平2013。〈点石斋石印书局及其举业用书的生产活动〉。《故宫学术季刊》31：101-137。
- 王尔敏1990。〈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传播之图说形式——点石斋画报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135-172。
- 王慷鼎1996。〈民国前《槟城新报》政论量分析〉。《亚洲文化》20：170-179。
- 王慷鼎1997。〈《槟城新报》编采部人员点将录（1895-1911）〉。《亚洲文化》21：171-180。
- 王慷鼎1998。〈独立前华文报刊〉。载《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林水椽、何启良等编1998b。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 吴龙云2009。《遭遇帮群：槟城华人社会的跨帮组织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 许明珠2010。〈康有为儒学国教化策略探析〉。《当代儒学研究》9：181-221。
- 姚楠、张礼千1946。《槟榔屿志略》。上海：商务印书馆。
- 约翰·哈勒戴著，顾德华译2019。《航向中国：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与东西文化交流》。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
- 颜清湟著，李恩涵译1982。《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
- 朱自存1998。〈独立前西马华人政治演变〉。载《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林水椽、何启良等编1998a。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 张伟2014。〈晚清上海石印业的发端与拓展〉。《历史文献》18：577-599。

- 宗山1925。《光华日报十五周年纪念特刊》。檳城：光华日报。
- Arnold Wright 1908.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 Ching Su 1996. *The Printing Presse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mong the Chin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 Hamed Mohd Adnan 2015. *100 Akhbar Melayu*. Kuala Lumpur: Institut Terjemahan & Buku Malaysia Berhad.
- Leona O'Sullivan 1984.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 Written Record of Missionaries and Printing Press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15-1847.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7: 61-104.
- Loh Wei Leng 2013.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ercantile Personalities of Penang*. Penang: Think City.
- Md. Sidin Ahamad Ishak 1992. *Malay Book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tirling.
- Mohd. Dahari Othman 1979. Akhbar Cahaya Pulau Pinang (1900-1908). *Malaysia Journal of History, Politics & Strategic Studies*, 7: 115-121.
- Online Finding Aid (OFA), 1957/0113174W, Ask to Subscribe to Malay Newspaper 'Chahyah Pulau Penang'.
- Salma Nasution Khoo 2008. *Sun Yat Sen in Penang*. Penang: Areca Books.
- Sarena Abdullah 2018. Expanding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Early Visual Modernity in Malaya. *Wacana Seni Journal of Arts Discourse*, 17: 41-75.
- Straits Echo (SE)* 1 June 1903; 23 June 1903; 25 June 1903; 26 June 1903; 29 June 1903; 3 July 1903; 4 July 1903; 5 July 1903; 4 Sep 1905; 2 Nov 1910.
- Straits Settlement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81 (SSBB 1881)*.
-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SSGG)* 1896; 1900.
-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1908 (TD 1908)*.
-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1909 (TD 1909)*.
-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1910 (TD 1910)*.
-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1912 (TD 1912)*.
- The 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for 1881 (TSSD 1881)*.
- The Straits Times (TSS)* 16 Nov 1948.
- Who's who in the Far East, 1906-7 (WFE)*.